

編後語

今年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有四篇相關文章。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杜蘭 (Alain Tourain) 認為，儘管《宣言》開出的救世藥方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但在已實現跨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當今世界，《宣言》的現實性比其發表時更強，其批判精神也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另外三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都談到《宣言》的現實意義，但分析重點則有所不同。德利克 (Arif Dirlik) 重新閱讀《宣言》文本，剖析它的革命號召、歷史社會學理據、資本主義發展和演化趨勢，以及現代性批判等四個意義層次。張倫從詞意和歷史來討論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別，前者的含義是公社、共同體和社群，後者則淵源於協作、聯合；法國大革命後，特別是在本世紀初，這兩個觀念才逐漸合流。卞悟把共產主義實踐中的弊病歸結於「烏托邦的強制」，並從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理論以及蘇式制度來反思產生這種強制的的原因。不同於上述側重理論分析的文章，陳彥評介法國去年出版並引起熱烈爭論的《共產主義黑皮書》，該書強調要汲取社會主義實踐的慘痛歷史教訓；作者指出，不應像許多西方學者那樣，滿足於將共產政權與納粹相提並論的極權主義論述，只有研究兩者的差異，才能深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除上述一組文章外，本期內容相當廣泛、豐富。「百年中國」的三位作者分別談清末民初的社會和思想轉型問題，以及文革中民主黨派的命運。尹鴻介紹90年代中國大陸電影新生代的出現及其特點，他們正試圖衝破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佔據主流的定勢；陳燕遐用巴赫汀 (Mikhail M. Bakhtin) 的理論解讀莫言的長篇小說《酒國》的狂歡風格，認為小說是對1989年之後國族文化頹廢的深沉反思；張伯存的文章生動剖析去年病逝的作家王小波作品中所表現的強烈刑罰意識及其與軀體、權力和性的關係。除有關電影、小說和美術的文章外，本期王逸舟評介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美國重心」狀況及其未來趨勢；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在去年出版的新書中提出，如果要避免在歷史寫作中和民族國家聯繫緊密的民族主義線性敘事，就應採納他的「分叉歷史」；李猛卻以自己在華北農村做口述史調研的經驗，撰文質疑杜贊奇的觀點。

最後，本期兩篇批評與回應文章都相當尖銳、有針對性。本刊去年12月號發表美國學者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以及艾爾曼 (Benjamin Elman)、胡志德 (Theodore Hutters) 兩篇對何偉亞 (James L. Hevia) 得獎新著的完全不同評價的文章後，繼有張隆溪和葛劍雄參加論爭；今期羅志田指出，在解讀和翻譯史料上，何偉亞對「懷柔遠人」的引用比他的批評者更符合在傳統中國的政治含義。從今年4月號開始，李澤厚與蘇文、卞悟對當今中國的發展問題在「三邊互動」小欄目中筆墨往還，針對李欣賞的「發展是硬道理」，蘇文提出「公正也是硬道理」。